

# 从沙船业主到官绅和文化人

## ——近代后上海本邑绅商家族史衍变的个案研究

易惠莉

华东师大历史系

**摘要:** 近代后在上海本邑绅商家族从事的主要行业沙船业、布业渐趋衰微的背景下,从经营这些行业的家族走出的新一代绅士,继续在本邑政治社会文化事务方面居于重要地位者不乏其人,但在近代性的商业经济领域有所建树者则难得一见。笔者以为在承认商人家族传统的演变规律的影响力外,其中仍有值得探讨的现实客观因素。

**关键词:** 上海沙船业主;官绅;家族史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决定商人处在一种不是“轻视”一语所可言尽的微妙地位上,社会地位的微妙性决定商人家族中不可能产生出世代经商的天职意识,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在时局环境和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外在因素之外,这构成了中国商人家族缺乏延续性发展的内在因素。近代后在上海本邑绅商家族从事的主要行业沙船业、布业渐趋衰微的背景下,从经营这些行业的家族走出的新一代绅士,继续在本邑政治社会文化事务方面居于重要地位者不乏其人,但在近代性的商业经济领域有所建树者则难得一见。笔者以为在承认商人家族传统的演变规律的影响力外,其中仍有值得探讨的现实客观因素。

选择沙船业及王氏家族作为个案研究是基于以下的理由:乾隆年间江苏海运出海口逐渐南移上海,由此启动了上海县城的传统城市化进程,道光六年(1826)清廷漕粮海运的举措更为该进程注入了新的活力。该年为庆贺漕粮海运成功县城重建先棉祠,建祠碑文所谓:“今兹幸以沙船运漕,懋著成绩,而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如实地反映了从事北洋海运的沙船业在上海商业繁盛中的重要地位。沙船业在上海县城经济中的地位甚至未受到1843年上海对西方的开港影响,一批资产雄厚的沙船业主直到咸丰年间仍然是上海县城地方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咸丰年间沪上沙船业二十四家大商号中有:“王公和”号业主王庆荣、“王春记”号业主王庆勋是出自同一个家族,其中“王公和”更名列最大的八家商号之一,入选1855年重建的旨在维持沿海安全的捕盗局局董。王氏家族有《上海王氏家谱》传世,且同治、民国的三种上海县志也录有该家族人物颇多的资料,足以成为今天探索该家族作为沙船业主随着传统海运业的兴衰而演变的过程依据,从中亦可获回答上述问题的某些线索。

### 一、沙船业主王文源、文瑞兄弟

上海邑城王氏家族道光年家业发达后始修族谱,有文字追溯的家世仅及康熙三年(1664)从上海县周家渡迁居县城大东门外太平巷一辈,从而被尊为始祖。王氏家族的发迹与上海地方经济的起飞基本同步,道光年间以沙船业起家的王文源(号春泉,1761—1832)、王文瑞(号辑庭,1764—1835)兄弟系王氏第五世。文源、文瑞兄弟幼年丧父,其母“苦节抚养”,

“家徒壁立”，自少“学绞索艺”谋生，后与人合资“聚所绞索为肆，始释手中艺而经营焉”；“继随商船往返渤海辽沈间，贸迁有无，家始渐裕”。家业初创后的文源、文瑞兄弟“两家未析产”，文源“以业专任”文瑞，文瑞再“以业分任”于文源诸子映澄、映秀、映坤经理，直至文瑞“年逾六十”——1820年代中期——以后“始析产为两，割宅而居”，六归文源，四归文瑞。文瑞主持家业期间颇有冒险开拓的商人精神，涉足贩销木材，“同业贩木旋罢”，文瑞“独任之”予以坚持；“关东山左海舶往来者，市菽为多，市人常以货多杀价”，文瑞即“设栈以贮之，且往武林以运之”。尽管王氏家业发展甚快，但是最大的一次机遇还当系道光五年（1825）的漕粮海运，文瑞“以自置海船若干只，龟勉急公，转运无误”。漕粮海运及此后上海整体快速发展的经济环境加速了家业资产积累的速度，提供了文源、文瑞兄弟分家的动因，也从而有文源、文瑞兄弟于道光十二年（1832）在上海城东“建立宗祠三楹，嵌（其母）节孝事实图于壁间”，并“共治一宅于城南门外”。<sup>[1]</sup>建宅并设宗祠，这是王氏家族家业发展达顶峰状态的标志。1862年随“千岁丸”访沪的日本武士名仓信敦曾多次入访王宅及祠堂，有“高堂结构甚巍巍”，“尊居堂宇广大，结构宏丽，诚以为耐惊，盖大官高爵之居宜如斯”，“庭上之卉木亦皆珍奇”等叹赏语。<sup>1</sup>而这已是经历了小刀会事变劫难后的王氏宅第状况了。

中国传统商业社会，商人家族以经商致富后，均以捐纳、或投资子弟的科举事业，提升家族的政治社会地位，王氏家族的发展轨迹亦不出这一范围。文源、文瑞兄弟均“从未入塾受师”，即便长期主持家业，“料事明决”，并掌握“斤两乘除诸算法”的文瑞，亦终身“不识字”，但文瑞还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创业一代即推动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过渡。文瑞先有“以义赈叙九品职衔”，道光五年海运事竣再得“钦加七品职衔”、再以建宗祠伸张节孝传家的家族传统。

文瑞之子寿康主持编撰的家谱，于文瑞有如下赞辞：

“存心孝友，用意慈仁，料事明决，凡遇地方公事，无不踊跃争先，为一时领袖。

生平当作之事，度其大小缓急次第为之，几无遗憾，故远近大人先生莫不重公之为人，为之折节下交焉。”

儿子的赞语难免夸大，但文瑞在沪上有商界楷模之誉则亦是实情。<sup>2</sup>至于文瑞热心地方公益事务对于自身家族的意义，值得提及道光十六年（1836）二月“江南提标水师右营移驻上海城守分府”，曾为拆除王氏家族祠堂前街道搭建房事专门发布告示，此事是文瑞及其家族在地方有影响力的反映。道光年间先后出任驻守上海县城的江南提标水师右营游击的是侯澄、侯攀凤父子。侯氏靖江人，侯攀凤有武举人功名，联系侯攀凤与文源之孙结为儿女亲家事实来看，王、侯两家的关系之深及由来之久是显然的。至于同负责上海近海海防安全的水师将领建立起如此关系，对经营沙船业的王氏家族的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

## 二、文瑞一支由商人到知识精英的衍变

文瑞以创业的一代启动了家族由一般商人向绅商的演变。王氏家族文瑞一支的后辈们的生活经历将商人家族到绅商家族的传统演变规律演绎得淋漓尽致。首先表现在文瑞独子寿康（号二如，1795—1857）的教育经历，从中可以透视尚处创业期的商人在子弟教育问题上的态度及立场。见寿康之子庆勋作《二如府君行述》所记：

“（寿康）三岁能识字，七岁入塾，年十三从宝山钟霖溥先生读书于南关杨氏，盛夏寒暑无稍间。年十六，大父（文瑞）命学理财。府君稟曰，儿请毕五经以从事可乎。大父喟然曰，我岂不愿汝读书，苟能是，固为老母所深喜。遂延钟先生于家。……甲戌（1814）吴门蒋轩霞先生掌教吾邑敬业书院，府君奉大父命从之游。”

嘉庆二十三年（1818）寿康“补博士弟子员”，但后“屡应秋试不售”。作为商人子弟，寿康科举正途发展的不顺，得以用捐纳补充——“道光十五年捐建合邑节孝祠，赏加盐运司提举

衔，二十二年海疆经费钦加知府衔，即选直隶州知州”。<sup>3</sup> 捐建节孝祠不但致王氏家族在道光年间地位骤增，而且长期跻身于本邑有影响的绅士行列。邑城文庙洒扫局的款产“向由司总会同捐建节孝祠之王氏后裔管理，光绪二十一年起议定公举洒扫局司月两人，王裔两人，凡四人轮年管理”。<sup>[2]P61</sup> 道光年间王寿康在沪上绅士界的活跃即有此背景。

王寿康“秉其尊人辑庭先生家范”，在宗族及地方慈善事务方面有所作为：“扩宗祠，辑族谱，置义庄田赡族，每年冬施絮，夏施药，岁饥施粥，筑法华至城石路，群称王善人”。寿康“诗文皆有矩度，尤工书”，其社会活动自然远超出文瑞的领域和层次：“招邑中能文者，月角艺于曙海楼，刻同人会艺”；“留心经世，刊古文经训、资镜等集，重刊徐文定光启农政全书，上三吴种植所宜并救荒各策于林文忠则徐，激赏之”。<sup>[3]P58</sup> 寿康于 1835 年因父文瑞故世“由是以一身担承家务经营”。尽管从科举中半途退出而从事经营商业者中不乏成功的例子，但对于被王韬誉为“性醇谨”，“行谊笃挚”，“雅近古人”，且已入不惑之年的寿康大约是勉为其难的，而且对于寿康的子辈亦是如此。文瑞一支自寿康一辈在商业领域的发展已不如文源一支，这一点在下述事实中可见一斑。继道光六年后，二十七年（1847）再办漕粮海运，王氏家谱中有文源长子映澄“承运漕粮出海赴津二万石”的记录，寿康门下则无参与的记载。后面的记录则表明寿康家业在 1840 年代后期已趋于衰退：“当戊申（1848）、己酉（1849）时，贸易多阻，势渐中落，海舶复连次遭风害”。尽管有如王韬所谓“家有海舶大小数十艘”的船主“偶失风波，家可立匮”的说法，<sup>[3]P81</sup> 咸丰年间寿康及其子名下的“王春记”号仍在沪上二十四家沙船商之列，但财力及规模大不如前则在必然。

虽然家业的衰退与家族中缺乏经营才干者不一定有必然的联系，但就经营人才而言，文瑞一支由寿康开始的向绅士转移的趋向在第三代——寿康的子辈——已达无法逆转的地步。寿康有五子，长子庆勋（字叔彝，1814—1867），附贡生；次子庆均（字季平），廪贡生；三子庆昌（字雨湘），附贡生。1856 年移建上海县学，庆勋、庆均兄弟同在“监工绅士”之列。庆均后曾任崇明教谕，庆昌则在咸同间主持南翔团练，同治年修上海县志出任“监理”。<sup>[4]P28</sup> 庆勋、庆均、庆昌三兄弟都在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取得比其父更大的成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庆勋。在文学方面，王韬誉庆勋“秉承家学，弱冠诗名已满海上，所交多名流”；张文虎誉其“意气豪迈，酷嗜诗，求才若渴，尝集刊朋辈诗曰同人诗录，曰应求集，曰可作集，其自著曰治安堂稿”。<sup>[3]P58</sup> 在参与政治事务方面，庆勋亦远超越其父。庆勋“先后董办海运凡八次”，其中“咸丰二年浙省试行海运，庆勋条列事宜”，<sup>4</sup> 次年小刀会据上海县城，浙漕海运拟改由宁波出海，“以沙船不习宁道，庆勋力排众议由刘河出口，刘河浅阻，请江浙协浚，商民便之”；与此同时庆勋“从嘉定张编修府创募华勇助剿”，“随官军克复盐城”，由此 1855 年后“赴浙以知府用”，官至署严州知府。<sup>5</sup> 咸丰年后庆勋在上海地方的影响力，在王汝润日记关于疏浚南翔河道的记事中呈现得颇为具体生动：

“南翔河淤塞数年，……润（王汝润自称）说先生（王叔彝）虽上洋籍，现居南翔，必须办通此河为是。叔即应允，到上海写捐壹万千。嘉邑照田征，每亩二十文，征万四千千。-----九年十月动工，十二月告成。-----莫大之利，叔彝成其事，嘉邑之幸也。”<sup>[5]P194</sup>

小刀会事变后寿康因“向居老屋亦颓毁，不能入住”，即定居于当初仅作避难之计的南翔镇。移居南翔及寿康故世前主持子辈分家，这些举措都表明寿康退出沙船业的意愿，至于从寿康孙辈更彻底的绅士化倾向则表明，即便时势仍然有利于沙船业发展，但文瑞一支退出该业已是势在必然。1857 年王寿康去世际，其已成年的孙辈除庆勋长子维贤“监生，分发浙江试用县丞”，有从事经营的可能外，庆勋次子维梅（字谷生，后改名维勤）、三子维和（后改名维俭、俭），庆均长子维孝、次子维金均在业儒。<sup>[1]</sup> 且寿康孙辈于同光年间的发展甚少受大上海近代化进程的影响。王维勤“幼嗜学，受经于钟子英，学文于童子佩”，“遭寇乱不废读书”，“同治五年补行元年壬戌岁试，以第一名入邑庠”，“学邃于经史”，后有“附贡”

功名，“宣统纪元邑人公举孝廉方正”。<sup>6</sup>庆昌“工诗善倚声，著有昔梦词行世”，其长子维杰（字梓生），“附贡生，亦工诗，名隽有父风”；次子维泰（字柳生），光绪二十年（1894）禀贡生；三子维城（字汇生），“廩膳生，工倚声”。<sup>[8][P15]</sup>

在普遍绅士化趋向下，王氏第八、第九世子弟中自然亦不乏适应近代变化而有所作为者。如庆均长子维孝之子王树善（字杉绿），光绪十五年（1889）“顺天榜附贡生增”，1890年代后期曾任广方言馆汉文教习，并与傅兰雅合作译书，后历事“出使英法等国随员，新金山领事”，有“直隶即补道”身份。<sup>[9][P8]</sup>又如宣统二年（1910）上海自治公所设立议事会，维勤长子王纳善列名乙级议员，并曾相继出任副议长、议长。<sup>7</sup>然最著者仍莫过于王维泰及其侄王植善于清末的办学活动。维泰“禀贡生”的绅士身份，决定了他参与地方政治事务的能力。甲午战后“当道拟加松属各县典业税”，维泰“奔走宁、苏吁免，事不获行”；辛亥革命期间维泰受“沪军都督府”民政部长李钟钰派遣赴南汇解决动乱危机。<sup>8</sup>维泰最大的建树则是他在新式教育领域所作努力。1896年维泰禀请两江总督允准，就其家塾延一英文教师加课英文，并命名为“育材书塾”。次年维泰将书塾由南翔迁至“上海大东门内王氏宗祠之省园”。育材办学摈弃举业，而以出洋游学为目标，开设课程中文、英文、算术，学生多王氏家族善字辈子弟，也有日后成为名人的顾维钧。维泰子王宰善、庆勋五子王维诰子王守善作为育材学生于1899—1900年间赴日本留学，随时代变迁成为新式知识人。<sup>[10][P3-4]</sup>1901年夏，育材书塾改名育材学堂由肄业南洋公学师范班的王植善接办。后王维泰就职江南制造总局，1905年前广方言馆改制为兵工专门学堂及中学堂，维泰任校长，故世于民国初。<sup>9</sup>

王维泰父王庆昌“晚年志在睦族，尝集资置公产，拟家塾规则以教子弟，今王氏育材学堂有昉也”。<sup>[4][P28]</sup>维泰办学实有实现其父夙愿的意义，王植善（字培孙，1871—1952）作为庆昌长子王维杰之长子，自1901年接办育材学堂后一生即矢志于此。植善光绪十九年（1893）入邑庠；二十三年（1897）两湖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创立，植善赴鄂就试，未果；归沪就南洋公学师范班试，“然虽获隽而困于资，总务何梅生怜之，委事斋务，藉津贴自给，始得竟其所业”。植善接手育材学堂后，“乃就上海大东门王氏宗祠省园建栖屋七楹，力谋扩充。与唐才常、蔡锷时过从”。1903年春夏植善赴日考察教育，1904年改校名为南洋中学堂，并长期任该校校长。南洋中学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得两江总督“岁拨补助费4200元”，次年购地18亩建起新校舍。宣统元年（1909）迁入新址，“厥后逐年扩建，学额骤增。并变更组织，改订课程，聘秦汾、丁文江、叶达前、胡敦复等分任教务。督导学生注重科学，予以养成坚毅朴厚之学风”。从而造就南洋中学为沪上名校，历经沧桑不衰。<sup>[6][P1343]</sup>

王氏家族文瑞一支在十九世纪经历了五代人的努力，从第五世“不识字”的沙船主文瑞演变为第九世的社会精英——近代教育家王植善，而该家族发家所凭借的经商传统则似乎早已荡然无存了。

### 三、文源一支由商人到官绅的衍变

王氏家族文源一支后辈的演变尽管呈现有不同于文瑞一支的特色，但由一般商人向绅商转变的趋向是同样的。文源之长子映澄（号鑑淳，1787—1850），“以家督自负”，“不读书”而专心经营家业，“俾叔弟得潜心诵读”。后映澄以“道光十一年（1831）水灾捐赈，由国学生议叙八品衔”；道光十五年（1835）前后县城城垣修整，映澄参与“设局劝捐”事务，捐银一千两，得“交部从优议叙”的嘉奖；再于“二十八年（1848）承运漕粮出海赴津二万石，钦加五品衔”。<sup>[11][P264-265]</sup>文源三子的发展趋向均完全不同于文瑞之子寿康，从中可见商人家族在设计子弟前途之际，兼有家族利益及子弟潜能的全面考虑，只要经营上许可就会全力支持子弟尝试科举。如前面所述文瑞独子寿康“幼即笃学”，表现出文化方面的潜质，家族就全力投资——聘名师，“屡应秋试”——予以培养，而文瑞则勉力于经营家业至死。至于文源诸子乏在文化方面发展的潜质，由是致力于经营方面发展，从而文源得以早早从经营上隐退。

文源、文瑞后辈在第二代发展呈现出来的区别，在第三、四代后辈中亦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文源一支的后辈中罕有科举正途成功者。不过，文源历代子弟并不乏尝试举业者，尤在文源长子映澄一门。<sup>10</sup>映澄次子庆棠，“幼工举业，偶患咯血遂辍试”，后以捐纳为“监生，候选郎中”；庆棠长子维圻（字荪甫，亦字申甫，1837—1890），则“甫成童，下笔千言立就，会寇乱不得试，乃由监生援例以花翎同知分浙”。<sup>[21][P20-21]</sup>映澄长子庆荣之子维镇（字亘甫，侯攀凤之婿），监生，同治年间以捐纳“题补杭州水利通判”。1862年夏维镇交游日本武士名仓信敦际，自称曾“同知浙江”，并谓“今冬欲入都”，“意欲请就京职之举”。<sup>[12][P44]</sup>文源的后辈维镇、维圻入仕所走的道路与文瑞的后辈庆勋、庆均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均属“杂途人员”，只是捐纳的基础有差异而已，庆勋、庆均分别有“附贡”、“廩贡”的科举功名。

文源的子辈致力于家业经营，在沪上沙船业界长期处在举足轻重的地位。道光十六年（1836）重建城隍庙戏台捐款名录中，王氏名下有“王公和”、“王利川”、“王如川”三号，其中有否属王寿康者尚待考订；至1856年上海二十四家商船号名录中，仅有“王公和”号尚存，在映澄子庆荣（字仁伯）、庆棠（棣庵）、映坤子庆模（字泉生）名下。“王公和”当时系沪上最大的八家商船号之一，并以此入“会捕局”八会董之列。凭借经营上的优势，文源的孙辈在地方事务领域取得完全不输于庆勋的地位。1856年春，曾主持过上海商船会馆的浙江名绅沈柄垣之子沈宝禾来沪遍访沙船主，<sup>11</sup>庆荣、庆模和庆勋同列接待的绅士之列。庆模在协助庆勋从事浙漕转道刘河海运事务后，又以“分发浙江候补知县”身份“驻局专办”船商捐务，并在1860年任职捕盗局。<sup>12</sup>

文瑞一支后辈如庆勋兄弟等是以科举正途打开进入官场的大门，并辅以捐纳扩展发展空间的，而文源一支则是单纯以捐纳为途径进入官场，其中又以王庆棠门下为最。庆棠长子维圻“咸丰庚申（1860）粤寇围杭，城中粮绝，维圻创用轮船运米千百石”，1862年“李鸿章方驻沪上留办转运兵米”。从而平定太平军后，维圻历充绍兴、湖州等府厘局总办。庆棠次子维煜（字卿云，嗣映秀子庆楨），“咸丰末年以监生助捕盗钜资，叙花翎盐运司运副加道衔分两浙，历充海运津沪总会办”，光绪年后以“运副”的官衔涉足浙江盐务。庆棠三子维藩（字价人），监生，董浙江海运沪局二十余年。<sup>13</sup>文源、文瑞后辈的发展，就社会文化的角度而言，呈现了完全不同的特色和途径，但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而言，则似殊途同归。光绪十八年（1892）上海《重修商船会馆碑》文中，已不见任何王氏家族成员参与重修商船会馆事务的痕迹，其早已退出该业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光绪年后，随着沙船业的全面萧条，文源曾孙、重孙一辈通过捐纳进入官场谋利的趋势越演越烈。见于民国县志记载有：映坤之孙维培（后名王培），“附监，署浙江常山县典史”，“补寿昌、会稽等县典史”。维煜五子全以捐纳：长子宝善（嗣王维镇）“监生，署直隶长芦济民场大使，保升知县”；师善（改名师曾）“监生，浙江候补典史”；积善“监生，浙江候补巡检”；本善“监生，浙江候补县丞，代理鄞县县丞，岑港巡检；煦善（改名春）“附贡，浙江试用知县”。相对而言，文瑞一支后裔捐官者就少得多，且仅见王庆勋三子王维俭一门：维俭“监生，两浙候补盐经历，署石堰、双穗等场大使”，维俭子焕善“监生，浙江试用府照磨”。<sup>14</sup>王氏家族子弟捐官浙江如此众多，想必与王维圻、王维煜兄弟（自然也包括王庆勋）在浙江官场建立的关系网相联系。退出沙船业后文源一支的家业资财的流向从中亦可略见一斑。

#### 四、王氏家族商业传统丧失原因的讨论

扬州凭借濒临长江、运河的地理优势，成就为清代盐业及漕运重镇，它在康雍乾三朝的极尽繁华基本上与上海县城在嘉道年后的迅速发展有相似的动因。道光年后运河漕运的衰败，尤其十二年（1832）两江实施的盐政体制改革——“纲盐改票”，由大盐商家族支撑起来的扬州城在“改票后不及十年”，“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sup>[13][P7]</sup>扬州

盐业的兴衰与上海沙船业的兴衰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可比性。一旦经营环境有重大的变动，战乱、灾害及政府对行业的经管体制性的变化，原先经营该业的商业巨子即全军覆没。这表明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的整体性的脆弱，它缺乏保险、融资等一整套商业配套体制。明清以来商人出身的言论者在以“士商异术而同志”争取商人应有社会地位的同时，又对财富抱以虚无主义的立场，实是中国传统商业经营体系整体性脆弱的反映。在此政治经济环境下，经营者个体资金也随时地转移向商业以外的领域——捐纳、或子弟的科举教育，或因分家而导致的家业分解。沙船业的王氏家族这样的发展趋向，于创业的第一代人而言，是在最低层次上——捐纳——展现，于第二代人即已进入了更高层次——科举、文化、慈善领域——的全方位的展现，于第三代人则以进入仕途官场为标志达到相当高的地步。王氏家族文瑞一支的发展趋向重复的是盐商的旧路，所谓盐商中“黠者顾与名人文士相接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sup>[14][P4]</sup>种种因素决定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家族延续的短暂性，即便中国进入近代以及动乱的时期得以推延，假以靠漕粮海运发家的第一批沙船业主进一步发展的充分的时间与空间，而这批沙船主家族能否数代延续也是问号。

虽然由于航运业造就了上海经济繁荣，但近代前的上海甚至不具备局部区域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上海绅商家族的影响及其政治文化活动的范围仅限于上海地方。在进入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上海本地绅商家族从事的传统经营逐渐趋于衰微，这些家族的新一代传人，尽管他们仍然在本地事务方面居于首要的地位，但基本上已经退出商界。这样一种演变趋向，究竟是近代后的时势造就，还是受传统政治文化（价值）的左右？中国传统社会商人处在一种不是“轻视”一语所可言尽的微妙地位上，正是这样的微妙性决定在传统商人家族中不可能诞生出世代经商的天职意识，牟利成为从事商业经营单纯、并唯一的追求，利害关系成为经营者进出商业领域的唯一依据。在时局环境及政府政策缺乏稳定性的外在因素之外，这是中国商人家族缺乏延续性发展的最大内在因素。

民国上海县志记：“吾沪帆船行驶北洋者，曰沙船，专走牛庄、天津等埠，道咸以前邑人业此者多致钜富，同治以来业日衰败，船日减少”。<sup>[15][P1]</sup>上海沙船业在咸同年间遭遇社会动乱、海上安全的威胁打击及西方轮航业的竞争，决定该业渐趋衰微的命运，然沙船业主的后辈并未凭借上海作为当时中国最发达的进出口贸易之地的优势以及临近租界的地理优势，在经济领域寻求具有近代性的发展途径，而只能在传统的范围内寻求出路，如在科举、捐纳求官外寻求包括典当业等传统的经营活动。这样的局限性不只表现在沙船业界的王氏家族，沪上传统的豆米业、布业经营家族也同有如此现象。推而广之，扬州盐业家族在道光年间的消失，山西钱业家族在光绪年中后期的消失也都具有相似的意义，即中国传统商业经营凭借地理经济条件形成的地域乃至家族网络和模式一旦形成，突破该网络和模式寻求新的发展的难度及成本似乎相当大。如果顺此思路解读开港后的上海经济舞台上身手不凡的广东香山藉、浙江宁波藉、江苏苏常锡藉商人群体出现的原因，似可以这些地方恰是清代中国经营西洋贸易、东洋（日本）贸易的地域范围，当地原已经存在的外贸经营传统的网络和模式十分便捷，并成功地适应近代时局变化实现了异地经营的转移。

#### 参考文献:

- [1] 上海王氏家谱[M]卷2
- [2] 上海县续志[M]卷9页6.
- [3] 瀛壖杂志[M], 8, 28, 58.
- [4] 嘉定县续志[M]卷11页28.
- [5] 清代日记汇抄[M], 194.
- [6] 上海王氏家谱[M]卷2.
- [7] 上海县续志[M]卷17页1, 12, 14.
- [8] 民国上海县志[M]卷15页6—7.

- [9] 上海县续志[M]卷16页8。  
[10] 嘉定县续志[M]卷10页3—4。  
[11] 林则徐集[M].中华书局1965年版,264—265。  
[12] 上海县志[M]卷17页29,44。  
[13] 金壶七墨.浪墨[C]卷1页4,7。  
[14] 金壶七墨.遛墨[C]卷1页4。  
[15] 民国上海县志[M]卷12页1。

#### 注释:

1. 名仓信敦《沪城笔话》六月初九(7月5日),六月十五日(7月11日)。《沪城笔话》(写本),藏于日本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特别文库“特别买上文库”,编号3800。
2. 沪上绅商叶介寿传文,誉叶氏“师王文瑞、沈志明之为人,市廛称长者”。《上海县志》同治十一年,卷21页49。
3. 道光五年承办漕粮海运事的背景下,文瑞之母张氏蒙江苏巡抚张师诚“专请旌表节孝”,十三年(1833)文瑞“捐学西偏地一所”,“详请节孝贞烈妇女总建坊祠”,十五年(1835)“文瑞子寿康秉承遗命捐建”。《上海县志》卷9页23。
4. 即咸丰二年出台的《飭议浙漕海运运河运章程》,议定在沪“设局于小南门外,由浙抚派员来沪”主持。以此为起端,王氏家族参与此后历届浙漕海运事务,并发展了与浙江地方当局的关系。该届海运江苏则“奏委上海绅董王承基等押送”。见《吴煦档案选编》第六辑,第135—142页;《瀛壖杂志》第28页。
5. 《上海县志》卷21页48—49;《上海续县志》卷18页20。1860年春太平军陷苏州,上海道吴煦“委王叔彝雇炮船二十只,土勇五、六百名前赴昆、青交界之葭葑浜扼堵”,以固上海防卫。见《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223页。
6. 传文称王维勤在1867年其父王庆勋故世后,“遂绝意仕进,一以教养弟妹为务”。《上海县续志》卷17页1;《民国上海县志》卷15页6—7。
7. 王纳善当选似应与其作为王氏后裔参与文庙洒扫局款产管理相联系。《民国上海县志》卷2页14、15。
8. 南洋中学堂积极响应沪军督府的捐饷活动。《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2、712页。
9. 李钟钰1903年任江南制造局提调,王维泰在制造局任职及在辛亥革命际的活动似应与此相关。《上海县续志》卷11页1;《李平书自叙年谱》第50页。
10. 南洋中学“图书馆规模与时沪校望尘莫及也”。与植善同期肄业南洋公学师范班的邑绅吴馨创办“务本女学”,聘植善妻沈竹书(?—1916)任舍监。周邦道《王培孙先生传略》,《广清碑传集》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43页;姚明燿(姚文栋子,植善表弟):《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上海地方史资料》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27—30页;黄世祚:《王氏沙泾墓域记》(上海图书馆馆藏《上海王氏家谱》中所夹油印散叶)。
11. 文源次子映秀之长子王庆楨(1817—1847)“因屡病,日以习静为事,有烟霞之癖”,“家富于资但除购书帖及周恤之外,俭约不异寒素,居常吟诗习字自遣,绝无些微纨绔习气”。庆楨妻朱氏系文庙洒扫局“司总”朱增沂之女。《上海王氏家谱》卷6。
12. 沈宝禾,浙江桐乡人,道光十五年(1835)举人,其父沈柄垣(1819—1855)嘉庆十五年(1810)举人,道光年间历署上海、南汇、元和、崇明知县。上海开港沈柄垣“以苏州督粮同知,改官为松江府海防同知,移驻上海,专管通商”,即中西交涉事务,时间长达五年。其间道光二十七年(1847)再次漕粮海运,沈柄垣以海防同知主持江苏漕粮“于上海交兑起运”事务,当年因漕粮海运引发失业漕运水手滋事的“青浦教案”,直接影响运漕沙船出海,沈柄垣亦是与英驻沪使节交涉的主要参与者。离任后沈柄垣受聘主讲敬业书院,至1853年“当事创筹沙船捐,知商人素重公,强起主其事”,即主理上海商船会馆。沈柄垣于1855年去世,沈宝禾来沪据“商船会馆主关书”遍访沙船主,其日记留下沙船业主的名录,见沈宝禾1856年2月1日日记:“昨(潘)清泉交道商船会馆主关书。今早即拜王永盛桐春于咸瓜街,郁森盛泰峰于乔家浜,沈生义晚香、王公和仁伯、棣庵于新马头,李久大也亭于王家马头,郭万丰鬯庵于小东门里洋行街,经正记芳洲于药局弄同仁堂,肖星记棣香、绿生于屠家湾,此为船商之最著者”。“王公和”号即为王庆荣(仁伯)、王庆棠(棣庵)兄弟所有。见沈宝禾《忍默怨退之斋日记》,《清代日记汇抄》第240页。据道光十七年(1837)《重建上海县城隍神庙戏台碑》所列捐助商号名单,其中郁森盛号、沈生义号、王公和号、蒋宏泰号仍在1856年船商二十四家之列。见《上海碑传资料选辑》第29页。
13. 王映坤以子庆模职封“奉政大夫”。《吴煦档案选编》第一辑,第248页;第六辑,第242页;《上海县志》卷17页29。
14. 《上海县续志》卷18页21。王维煜光绪年间任职浙江及漕运事务,交游于江浙官绅,见于陈其元笔记。《庸闲斋笔记》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50页。

---

**From Shanghai's sand boat owner to gentleman and liberator  
— On the study of shanghai bureaucracy and businessman after  
modern times**

Yi Huili

(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History)

**Abstract:** after modern times shanghai gentleman and businessman family mainly live on sand boat and cloth profession which gradually downfall. The new generation gentleman come into being from these profession and they still stand in senior in the aspect of politics ,social and culture events, but almost no one may gain achievement in the aspect of modern business. The author thinks of that there still has reality impersonality factor, in addition to admitting the force of the evolvement rule of the businessman family tradition.

**Key words:** Shanghai's sand boat owner; Gentleman and businessman; Family history

收稿日期: 2006-8-4

作者简介: 易惠莉,女,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